

台灣當前的文學思潮

◎周慶華

一、前奏曲

大約從二十世紀八〇年代開始，台灣一地文學的生產、傳播和接受快速地進入一個複雜而多事的紀元。

說複雜，是因為台灣已經變成文學理論的風向球，所有世界各地出現的新理論，幾乎都匯聚到這裡來相繼流行，再加上本地學者殫精研思而成的一些理論，使得台灣達到空前的容受量（參見拙著《台灣當代文學理論》）。其中有的涉及創作（生產）觀念，有的涉及批評（接受）觀念，有的涉及傳播觀念。連番上演和實踐的結果是：促使大家對影響／反影響課題更深入的省察，以及對文化霸權的強力支配和自主意識如何落實等產生諸多的疑慮（參見拙著《文學圖繪》）。

說多事，是因為隨著八〇年代後期動員戡亂時期的終止、黨禁報禁的解除以及開放大陸旅遊、探親和文教交流等政治氣候的變動，立場相異的文學人也趁勢走向台前捉對叫囂比劃；有些明顯帶著政治實踐性格的文學人，紛紛樹立起反帝、反封建、反強權、甚至反父權的旗幟，在文壇左衝右突，既熱鬧又緊張萬分！此外，海峽對岸的評論者也藉機強化在台灣文學的發言權或解釋權，有關台灣文學史的著作一本一本的出版，並且嘗試透過中介在台灣翻印流傳，造成此地「史觀」上形勢比人弱的弔詭現象。於是不同文學理論流派「暗裡」

相互較量猶有不足，又加上文學人「明著」你爭我奪由文學衍生出來的權益，台灣文壇不質變和量變也難！

這種情況，發展到九〇年代初期，又有了新的變化。向來引進台灣而曾經風行或來不及風行的創作觀念（如象徵主義、未來主義、表現主義、存在主義、超現實主義、魔幻寫實主義、現代主義等）和批評觀念（如形式主義或新批評、精神分析學批評或神話原型批評、結構主義、符號學、現象學、詮釋學、讀者反應理論、接受美學、對話批評、後結構主義、解構主義、後現代主義、新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新歷史主義、後殖民主義、混沌學批評、系譜學批評等），漸漸銷聲匿跡，只剩女性主義和後殖民主義在「獨撐大局」（並由批評觀念過渡到創作觀念而成為踐履的強勁隊伍）。原因大概跟它們的「戰鬥性」和「易操作性」特能滿足當代台灣人的胃口有關。然而，這也「好景不常」，九〇年代末期網路文學興起，所有舊帝國所刻意區別的界域，都在網路這一跨性別、跨階級、跨種族、跨國家的新型媒體中失去了它們的屬地；女性主義和後殖民主義自然也得走入歷史。一個標誌著「數位革命」的時代正在來臨，台灣的文壇又即將釋放出另一種能量。

基於這個因緣，台灣當前的文學思潮，是很可以好好探討的。它一方面能為新舊世代的文學觀進行例行性的總結和展望的工作，另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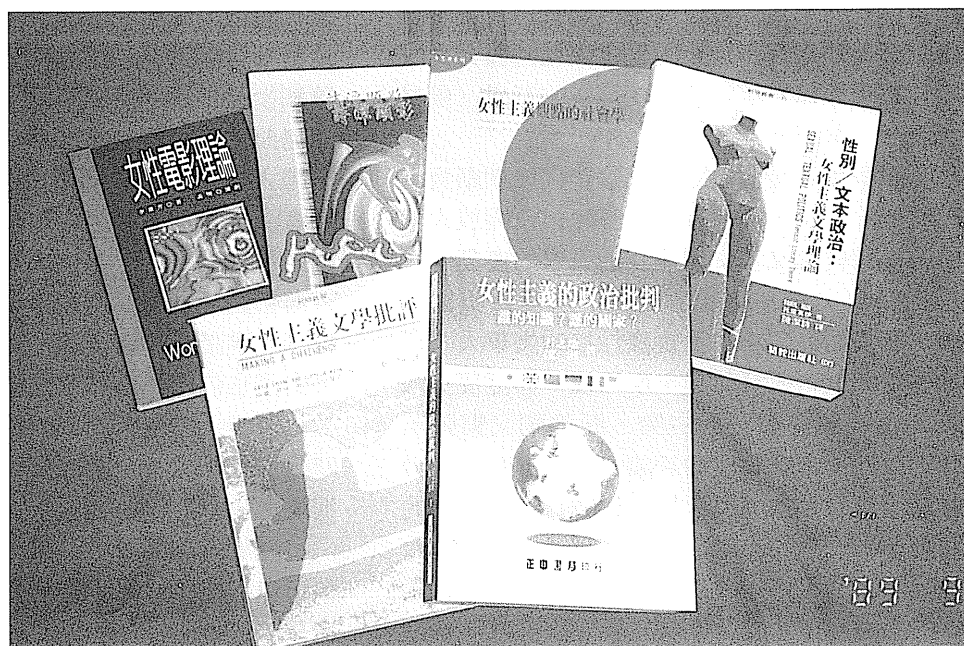
方面還能窺探或預期此地文學心靈的崇尚或歸趨。此外，作為一個文學愛好者，也可以藉它來發聲，以便在言論市場取得相對的優勢地位。

二、女性主義退潮

在正式探討台灣當前的文學思潮前，理當為文學思潮做點界定以及為如何取樣預行交代。一般所說的文學思潮，在西方多以某種主義來指陳，如人文主義、古典主義、浪漫主義、寫實主義、象徵主義、未來主義、表現主義、存在主義、超現實主義、結構主義……等等；在我國原來沒有什麼「主義」，因而論述思潮的變遷時用詞多不一致，有的以「運動」來表達，有的以「精神」來陳述，有的以「派別」來界說……紛紛紜紜（參見郭育新等《文藝學導論》、李牧《疏離的文學》）。雖然如此，有的思潮含有一套嚴謹的理論體系，可以作為創作或批評的法則（如寫實主義、結構主義等）；有的思潮只是對某一現象的描述或期

待（如人文主義、未來主義等），並未自成一套體系。台灣近來所引進的文學思潮，大都屬於前者，而且披靡當代世界文壇，頗有「普世性」特徵可以辨認。基於跟世界同步或同調「看好」的理由，個人選了女性主義、後殖民主義、後現代主義等幾個「長期」以來持續具有影響力的思潮作為探討對象。現在先看女性主義部分。

女性主義是一種政治，它是一種旨在改變社會中男性和女性之間現存權力關係的政治。這種權力關係構成了生活的所有領域，包括家庭、教育和福利、勞動和政治世界、文化和休閒等等，「它們決定了誰做了什麼以及為了誰，我們是誰以及我們將是誰」〔參見維登(C. Weedon)《女性主義實踐與後結構主義理論》中譯本〕，確實有其不盡合理處。換句話說，女性主義是對「厭女主義話語」的反擊，同時也是對女性禁忌和等級秩序的質疑。它從馬克思主義那裡獲得了「否定意識」和「批判」性話語；從解構主義那裡獲得了「消解」男性／女性二元對立和顛覆既定等級秩序的解放策



女性主義著作 女性主義堪稱二十世紀後半葉的熱門話題。(周慶華提供)

略；從詮釋學那裡獲得了「重寫文學史」的視界和對歷史重新詮釋的最佳角度。這樣一來，女性主義作為一種新的理論話語置入了當代文化，從而使長期被放逐在男性中心權力文化之外的女性「邊緣文化」，成為二十世紀後半葉的熱門話題（參見王岳川《後現代主義文化研究》）。

從總的層面來說，女性主義在發展的過程中，又衍生出了許多派別，如自由主義女性主義、社會主義女性主義、存在主義女性主義、基進女性主義、精神分析女性主義、新社會主義女性主義、女同志理論、後殖民女性主義、生態女性主義等（參見顧燕翎主編《女性主義理論與流派》）；同時還橫向各領域而建構起以女性學為核心的新學科，如女性主義政治學、女性主義社會學、女性主義文學理論、女性主義電影學等〔參見石之瑜等《女性主義的政治批判——誰的知識？誰的國家？》、亞伯特(P. Abbott)等《女性主義觀點的社會學》中譯本、莫伊(T. Moi)《性別／文本政治——女性主義文學理論》中譯本、李臺芳《女性電影理論》〕。這些都已引進台灣，並曾發生或大或小的影響。而我個人也有過預言：原先台灣文學史的建構過程所存在的爭論，會在女性主義的介入下而大為改觀。也就是說，女性們會站出來抗議，她們才是長期遭壓抑、剝削、忽視，甚至遭摧殘的受害者。舉凡文學作品中的性別歧視、性暴力、性暗示、性騷擾……都會促使女性們揭竿而起，向「男性沙豬」（父權體制）開火炮轟，使得一部台灣文學史不成為一部台灣文學史（而是男性主宰女性的殘暴史）（見拙著《台灣文學與「台灣文學」》）。雖然這並沒有應驗，但有關女性文學或女性詩學的呼聲和實踐，卻已在許多角落滋生蔓延，略有點線面擴大發酵的態勢。

縱然如此，女性主義從興起以來，就不斷遭受質疑和批判。它在國內也難免同樣命運，

如「女權批評家對文學和社會的關係，大多以男、女性的典範為主，因而對社會的複雜藝術條件，如技藝、機構、經濟因素無法提出圓滿的解釋」（見廖炳惠《形式與意識形態》）、「依目前的情況來看，我寧可將女性主義的批評當作是人文主義者的掙扎來讚揚。也許透過女性主義批評的努力，可以軟化人們在父權體系下孕育出來的功利思想和行為上予奪予取的侵略性。這一點如果能辦得到，也無疑是大功一件，可是究竟能否達成，誰敢樂觀？人文主義不是已經在科技、經濟掛帥的社會價值中失落了嗎」（見蔡源煌《從浪漫主義到後現代主義》）、「女性主義批評發覺一個又一個的文本或現象，證明父權壓迫的存在。這些研究的貢獻讓我們認識到承載父權意識的文本無所不在，也教導我們（尤其是女性）成為抗拒的讀者。但是這類研究累積到一個程度之後，不免令人焦慮的是接下來？不斷證明父權壓迫的無所不在，除了令我們窒息、憤怒、難過之外，我們如何從中學習、站起來、往前走呢」（見林靜伶《語藝批評——理論與實踐》）等。這不論是批評它的化約作法，還是質疑它的人文價值，或者慨嘆它的循環論證，都顯示不盡認同女性主義；但這卻很少看到彼此「正面的對話」，幾乎只停留在「各自表述」的階段。

最近幾年，類似「一群女詩人希望打破長久以來台灣的詩壇被男性主導的事實，計畫以集體發聲的力量自立門戶，積極累積女性詩的創作量，並努力重新建立過去一直被邊緣化的女性詩學。將詩的革命納入婦女運動的一環……」（見女鯨詩社編《詩潭顯影》）這種調兒還是時有所聞，而且不乏搭配以具體的行動。但整體上女性主義已經「強勢」不再；相關的學術研討會或藝文活動少了，學界轉向研究範圍更狹小的同志、酷兒，而女性學的書也紛紛從市場敗退下來。這似乎代表著女性主義的口號喊不動了，或者沒有什麼人願意再細聽了（即

便是反對者也懶得再費脣舌批評了），「祥林嫂效應」再度出現。取而代之的同志、酷兒論述（參見紀大偉主編《酷兒啓示錄》、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主編《酷兒——理論與政治》），能否帶動風潮，還在未定之天。而一種越界的網路主義，已經「悄悄」的在經營它的王國。女性主義的餘波，終將要被這一新浪潮掩蓋吞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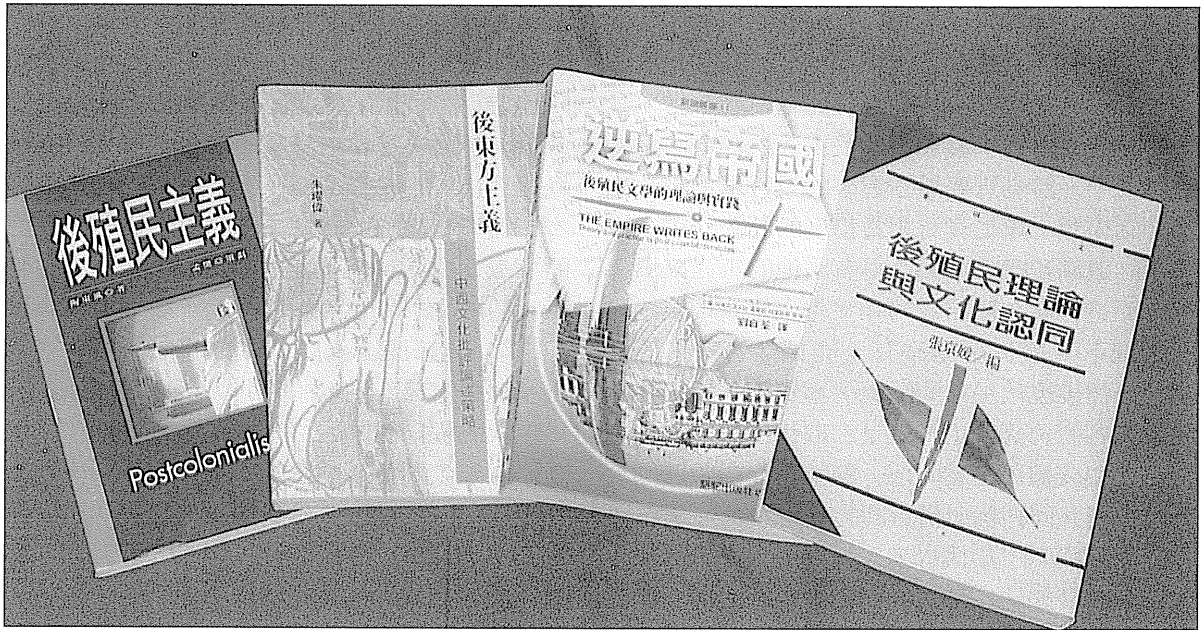
三、後殖民主義噤聲

同樣的，繼女性主義稍後而走紅的後殖民主義，現在也沉寂下來了。原來後殖民主義的理論重點，在於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非西方許多殖民地國家紛紛獨立，取得了國家主權，並開始擺脫帝國主義的控制；但由於其他原因，它們在經濟、政治和文化上仍無法徹底脫離對於原西方宗主國的依賴，而出現所謂新殖民的事實〔參見薩伊德(E. Said)《東方主義》中譯本、朱耀偉《後東方主義——中西文化批評論述策略》〕。這種論調，很快的也被轉用於發展抵拒（新）殖民的策略和行動，以致質疑和批判的聲音四起；所謂「它不能解釋：並不具有共同的殖民經驗的文化或社會之間為什麼存在相似性；同時也不能解釋：同樣是屬於殖民的或被殖民的社會之間為什麼存在差異性……還可以補充說，後殖民的關於壓迫與反抗的二元對立，不僅看不到被殖民者與殖民主義之間既對立又互動的關係，看不到被殖民者對於殖民主義的某些前提的贊同，同時也阻礙了對於身處遊戲之外者的民族與群體的作用的認識……最後，在後殖民主義透過劃時代的殖民主義的『終結』來確認自己的時候，它就變成了幼稚的烏托邦主義。後殖民的空想的『新世界』圖景透露出對於後殖民的創造性的盲目樂觀。事實上，這種新的所謂『創造性』與其說指向文化差異，不如說是殖民結構與本土過程相遇

的產物」（見陶東風《後殖民主義》）可以視為總結性的宣示。

然而，這並沒有減低文學批評界把它吸收作為新的批評利器。一些相關的基進性論述也逐漸模塑成形：「文學活動只是文化論述的一環……不可能脫離意識形態錯綜糾纏的廣大網絡而超然獨立……後殖民文學論述者指出，殖民壓迫的最大特色即是將語言書寫化為文化意識鬥爭的戰場……後殖民理論家認為，後殖民論述脫胎於被殖民經驗，強調和殖民勢力之間的張力，並抵制殖民者本位論述……以『抵中心』出發的後殖民論述因而視論述架構之重整為當務之急。殖民壓迫既然透過語言階級制完成，後殖民論述意圖瓦解殖民壓迫自然要從瓦解語言階級著手。在策略上，後殖民論述更替、並重新定位語言。主要步驟有二：第一，抵制殖民語言本位論調；第二，進行語言文化整合，建構足以表達本身被殖民經驗的語言」〔見張京媛編《後殖民理論與文化認同》。另參見阿希克洛夫特(B. Ashcroft)等《逆寫帝國——後殖民文學的理論與實踐》中譯本〕。這類論述，在九〇年代初引進台灣，不久就轉變成台灣鄉土、國族論述抗拒外來殖民（如繼日本之後統治台灣的國民黨政權）的有力依據（參見陳芳明《左翼台灣——殖民地文學運動史論》、江自得主編《殖民地經驗與台灣文學——第一屆台杏台灣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而它跟新馬克思主義對文化霸權的批判又可以合謀聯手（參見向陽《喧嘩、吟哦與嘆息——台灣文學散論》、楊照《文學、社會與歷史想像——戰後文學史散論》），試圖一舉掃除強權支配和意識形態國家機器控制的煙霧。

後殖民主義這種解構、顛覆的策略，在台灣內部究竟產生多大的影響力，並沒有人做過仔細的考察統計；有的只是不斷對它「流於排他和自閉下場」的質疑和憂慮（參見廖咸浩《愛與解構——當代台灣文學評論與文化觀



後殖民主義著作 後殖民主義在九〇年代初引進台灣。(周慶華提供)

察》、王德威《如何現代，怎樣文學？——十九、二十世紀中文小說新論》)。換句話說，後殖民主義批評也仍在前述烏托邦的氛圍裡討活計，根本忽略了台灣一地文學／文化生態的複雜性以及不易被歸類性。更弔詭的是一些控訴本地文化霸權的文人，已經積極地投身於網路社會的新貴運動，而忘了自己正臣服於一個勢力更強大的歐美日文化霸權之下。此外，向來一再宣稱自己遭受二重壓迫而雅不願認同大中國文學和台灣文學的原住民作家（見瓦歷斯·尤幹《想念族人》、台灣原住民文教基金會編《二十一世紀台灣原住民文學》），卻沒有停止過參加大中國文學團體和台灣文學團體的徵獎儀式（如《中國時報》主辦的文學獎和文學台灣基金會主辦的台灣文學獎之類）而從中獲取高額獎金並蒙受肯定和讚美。這又代表著什麼？是不是後殖民主義的假想敵真的只是假想敵，它的面目和邪惡程度，都可以在操縱者的擺弄下瞬息變色和增減分量？我寧可相信

「是」，不然又怎麼解釋上述這些怪異現象？

不論後殖民主義如何的被抨擊為「產生了一種徹底重新開始的歷史幻覺，一種徹底擺脫殖民影響的幻覺。這種關於『得到了改進的、統一的世界秩序』的觀念，既不能解釋當代社會中不斷增長的差異與矛盾，也不能解釋殖民形式在全世界的繼續延續。它也忽視了由跨國公司與國際勞動分工造成的新殖民主義的問題」（見陶東風《後殖民主義》），它在台灣內部可以預見會越來越沒有賣點。因為一個強調本土性的新政權誕生了，原有的對舊政權不滿的情緒得到了恣肆的釋放；而另一個全球化的網路族群正在此地蔓延擴大，資訊帝國的收編本事早已把大家帶向了「可以內鬥，但不能外敵」的自我欺瞞和無力反省的詭譎幻境。換句話說，台灣只要像現在一樣隨人高呼資訊社會的來臨，沒有一點批判和抵制的聲音，那麼後殖民主義就得持續閤默下去。

四、後現代殘象

其實，女性主義和後殖民主義的存在，對於社會中不時刻意要樹立起來的男性霸權和政治神話來說，還是具有相當程度的制衡作用。它們的退潮和噤聲，勢必得有其他的東西來填補；而這一點在目前政局和文化生態頗現混沌的情況下，顯然是還沒有人能預估答案。不過，一種後現代主義的餘風，卻不聲不響的襲向台灣各個角落。也許就是它取代了大家對女性主義和後殖民主義的部分熱情，而跟新興的網路主義共同狎玩形構台灣的文學場景。

回顧從六〇年代以來，後現代主義就以橫掃千軍的姿態站在時代的前沿，它的解構、去中心、不確定性、平面化、無政府主義等特色，不知風靡了多少久受禁錮而亟思高翔的人心。而這表現在文學創作上的就是沒了成規可循的「意符追蹤遊戲」以及不斷自我消解的「虛無主義作風」〔參見孟樊《當代台灣新詩理論》、吳渥(P. Waugh)《後設小說——自我意識小說的理論與實踐》中譯本、鍾明德《在後現代主義的雜音中》〕。向來就「不落人後」的台灣文學界，自然也感染了這一風潮而從八〇年代中期開始勇於實踐，終於把台灣文學推向第二波（繼現代主義之後）西化的高峰。它對台灣文學心靈所起的刺激解放功效，實在不小。當然，它在面對崇尚社會寫實主義且痛恨買辦文化的本土作家時，難免也要被詆諆為「無根」或「逃避現象」（見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彭瑞金《台灣新文學運動四十年》）；殊不知它已經在為末世社會勾繪一幅擾攘而無所止歸的圖象。

這幅圖象是從現代、前現代的舊勢力反撲開始的。後現代用它的大敘述來反對現代或前現代的大敘述，自我矛盾自是顯而易見的〔參見史馬特(B. Smart)《後現代性》中譯本〕，以

至論者紛紛斷言啓蒙時代的哲學、浪漫主義等等都將重新登上歷史舞台，或者一種復歸式的「批判社會理論」或「新歷史主義」即將走上政治、經濟、社會或詩學的前台〔參見阿皮格納內西(R. Appignanesi)《後現代主義》中譯本、貝斯特(S. Best)等《後現代理論——批判的質疑》中譯本〕。這後來幾乎無不一一應驗，造成文學界各種超前衛的實驗在進入新世紀之前，也很識趣的立即偃旗息鼓，以免趕不上「以復古為新潮」的時代腳步。雖然如此，後現代的解構衝勁並沒有減退，它仍然在文化各領域產生顛覆、啓新的作用；所謂「沒有什麼不可以」的社會，是在後現代之後才真正的來臨。而文學的後現代性，也正「激勵」了文學人走向徹底的無政府境地。他們的終點站，也許就在網路文學王國新築完成的城前。

現在復古風還在流行，而網路文學也正當起步，一切都顯得有點「青黃不接」。於是我們會看到一些沒有什麼功能卻又不盡全無道理的封疆式文學流派的塑造，如各種區域文學獎或類型文學獎的設立（前者，包括各公私機構或基金會所主辦的「台灣省文學獎」、「台灣文學獎」、「寶島小說獎」、「台北文學獎」、「夢花文學獎」、「磺溪文學獎」、「南投縣文學獎」、「南瀛文學獎」、「府城文學獎」、「菊島文學獎」等；後者，包括傳播媒體或私人機構或基金會所主辦的「旅遊文學獎」、「勞工文學獎」、「中華汽車原住民文學獎」、「全國身心障礙者文學獎」、「佛光文學獎」、「華航旅行文學獎」等），這跟幾大報（如《中國時報》、《聯合報》、《中央日報》、《中華日報》等）所主辦的「泛文學」獎相比，明顯有要凸顯地域或類型特色的用意；但台灣一地已被世界文學思潮浸染到無以復加的地步，想形塑自家面目又豈是容易？何況在台灣這個彈丸之地上還這般的切割地域和題材？又如大學或基金會所主辦的一些諸如武俠小說、歷史小

說、海洋文學、飲食文學、佛教文學、女性文學等學術研討會，企圖主導某一特定的文學風尚也很值得留意；只是「那又如何」？而且又有什麼保證可以把它們推向世界文壇？此外，一些出版社（如爾雅、九歌、洪範、前衛、新地、書林、巨人、天視、希代、正中等）曾經或持續的出版此地的文學或文學評論選集，表面上看似花團錦簇，實際上也依然不辨特殊面貌。換句話說，台灣文人幾十年來所作的努力，幾乎都在別人的籠罩之下；而唯一可以向世人展示的，就是高密度的文人組合以及勤於學習模仿的特殊興味。

如果不從上述「能否走出一條新路」的角度切入，我們當會發現有些後出「趕辦」的區域文學獎或類型文學獎，無不混合了基進作風（敢辦那些前人沒有辦過的文學獎）和保守意識（無法別出新意且仍困在傳統文學的框架裡）；其餘的學術研討會或文學選集，也如出一轍。而這正是後現代餘風未泯的徵象：大家競求發聲而不管新潮或復古，也不問台灣文壇是否真的需要這樣經營。然而，在面臨一個超國界的網路新世代，這毋乃是一種迴光返照式的殘象。它可能是台灣文人跨向新世代的前階，也可能是台灣文人抗拒不確定變革的徵兆。

五、網路主義

所有相關文學思潮的討論，最後似乎都得匯聚到網際網路一個焦點上，才有辦法繼續向前展望。原先「網際網路是美國國防部先進研究計畫局技術戰士的大膽想像計畫，它源於一九六〇年代，為防止蘇聯在核子大戰時佔領與破壞美國的傳播網。在某個程度上，它是種毛主義戰略的電子對等物，以在廣大領土中散布游擊力量，對抗敵人可能有的場域多樣性與知識。如同發明者所期待的，其結果為一種網路

結構，無法由任何中心所控制，而是由成千上萬的自主性電腦網路組成，它在各個電子障礙中，可以無數的方式相連接。最終，由美國國防部設立了奧普網路，成為成千電腦網路之全球水平傳播網路的基礎，全球各地的個人與群體，各就其目的使用網路，而離開了已過去的冷戰考量」〔見柯司特(M. Castells)《網絡社會之崛起》中譯本〕。這被認為是繼現代社會科學後的一大改變，「現代社會科學崛起於工業秩序創造的巨變中，它來自封建社會之廢墟。然而，世紀末的今天，巨變再度降臨。資訊時代的特徵正在於網路社會，它以全球經濟為力量，徹底動搖了以固定空間領域為基礎的國族國家或任何組織的形式」（同上〈譯序〉）。台灣地處東西文明的交匯處，自然也很快的趕上了這波網路社會的潮流。

網路社會所帶給文學人的衝擊，一方面顯現在嘗試運用網路這一新媒體而將文學作品數位化處理以廣為傳播；另一方面顯現在利用網路或電腦特有的媒體特質創作數位化作品以達多元的互動效果。這是一種嶄新的創作、傳播和閱讀的經驗，據考察在最近幾年已經吸引了許多台灣文壇的新秀，想要在網路上一展身手；同時一些青壯輩作家也盡出餘力而陸續設立專業網站，以便擴大他們的影響力（參見文訊雜誌社編《一九九八台灣文學年鑑》）。一個可以稱為網路主義獨領風騷的時代，顯然已經來臨了。它的多媒體、多向文本（超文本）、即時性、互動性等等特徵，把後現代所無由全面出盡的解構動力徹底的展現出來了。尤其是多向文本，不啻真正落實了文本是一個無始無終的建構過程的後現代「宣言」。所謂「多向文本真正實現了作品不再是單向封閉系統的說法，它可以作成道道地地、貨真價實的寫式文本。多向文本要求一個主動積極的讀者，多向文本泯滅了作者與讀者之間的區別。多向文本是流動的、多樣的、變化的，它既不固定又不

單一。多向文本無始、無終、無中心、無邊緣、無內外。它又是多中心、無限中心、無限大。多向文本是網狀式的文本，無垠、無涯，是合作式的文本，是沒有那大寫作者的文本，是人人都是作者的文本」（見鄭明萱《多向文本》），正說明了它永遠處在建構中（而不是「可以建構完了」）的特性。

當然，從整體來說，網路主義解除了一切畛域，自己不禁又成爲新的「疆界」、新的「中心」、新的「道」、甚至新的「宗教」，而不斷招來「科技毒害」的撻伐聲。但在台灣長期以來就走著一條「追隨式」的不歸路，現在置身新潮流中而想停駐不前，恐怕比登天還難；再說如果就此罷手，也難保有他處可去。因此，在文人一片「網路文學將在傳統文學的廢墟上重建」的歡呼聲中，其他人不跟著哀悼一個舊時代的逝去又能如何？只是我們還得小防「網路能不能給我們一股力量去抵抗商業扭曲後的價值，進而尋找到文學的本質」（須文蔚語，見《文訊》第一七一期）這類「詭計」。所謂文學既然已經要超文本化了，尋找文學本質豈不是在鬧封建復辟？這恐怕是對網路文學既愛又怕的矛盾心理的反映吧！

六、新悼詞

沒有錯，網路主義也是一個可以哀悼的對象。它固然開拓了我們的視野、滿足了我們恣意創作的慾望，但同時也阻絕了我們攀爬高峰的驅力、斷滅了我們追求理想的意志。我們不必成爲勇於發現新大陸的航海者，只要當一個不辨方向的泅泳者，或在高度無政府狀態中隱姓埋名而終了殘生。這是網路主義所透露給人的信息，我們能不感到悲哀嗎？其實，就台灣人來說，還有一些文學的桂冠尚未頂戴，更不能就此遁入網路文學的虛無中。

九〇年代初，就有人感嘆台灣盡是西方的

文學典律當道（見廖朝陽〈典律與自主性：從公共空間的觀點看「文學公器與文學詮釋」〉，《中外文學》第二十三卷第二期），甚至怒斥台灣文人的不長進：「我們這一群人到如今還是處於鴉片戰爭八國聯軍被征服者的地位上：西方人繼承著勝利的地位，我們繼承著失敗的地位……西化中國知識分子幫他們殖了中國人的心」（見顏元叔〈一切從反西方開始——爲「中外文學」二十週年而寫〉，《中外文學》第二十一卷第一期）。而現在也有人在爲「後現代、後殖民、反對大論述、拼貼技法、言必稱同性戀、言必稱身體自主」等西來的玩意兒大爲搖頭（見陳映真〈文學的世界已經變了——談新世代的文學〉，《聯合報》副刊，二〇〇〇年四月十日），或者對當代文學中充塞「情色、性慾、同性戀、性別倒錯、亂倫、器官特寫」等內容以及玩弄「後設、解構、拼貼、敘事觀點亂跳、造句故意不合邏輯等後現代技巧或多結局遊戲」等西式文學技巧深表不滿（見唐翼明〈看「二十世紀中文小說一百強排行榜」有感〉，《文訊》第一七〇期）。這可能會被新一代的作家反批評爲「義和團餘孽」而抵消了大家前進的步伐。但事實上我們確有需要試探一條可以贏回尊嚴的新路，而不光是像現在這樣但以撿拾別人唾餘爲滿足。試問在經歷這一番文學數度西化的波折之後，我們又能想出什麼新招數？